



評論
th

APEC財長會議帶給香港的機遇與考驗



議事
論事

林龍安

政部長或代表，連同國際組織負責人，約500人齊聚香港。這是APEC會議首次落戶香港，由國家財政部主辦、特區政府承辦。時值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剛公布之際，這場會議的意義已超出一般國際會議，成為觀察香港如何在國家新五年規劃中自我定位的一個窗口。

從「參與者」到「搭台者」

香港自1991年以「中國香港」名義加入APEC，三十多年來一直是亞太財金對話的「參與者」。今次由「發言者」變為「承

辦者」，意味着香港不僅在會場內發表意見，更在會場外搭建平台，參與議程的組織與落實。對照「十五五」規劃，香港的定位由「融入」升級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八大中心」亦擴展為「十大中心、兩大樞紐、一個生態圈」。由「融入」走向「服務」，要求香港由被動對接轉為主動作為，而承辦財長會議，正是把規劃文字化為國際舞台上具體實踐的一次演練。此外，今年中國擔任APEC東道主，11月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財長會議可說是前哨，港深聯動亦清晰可見。

今屆會議圍繞四項議題：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財經人才交流。表面上各有側重，實則與香港的比較優勢多有契合。各經濟體普遍面對穩增長、

防風險、保民生的壓力，民生財政須在可持續與包容之間取得平衡，香港長年奉行審慎理財，經驗具參考價值。數字基建方面，人工智能與數據中心帶動投資需求急升，單靠公共財政難以為繼，動員私人資本成為關鍵；香港擁有成熟的債券市場和國際投資者網絡，具備擔當「融資橋樑」的條件。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會見亞投行行長時，便歡迎亞投行利用香港債市發債，引導資金投向優質綠色項目。至於普惠金融與青年人才，則呼應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以及建設國際人才高地的目標。

當然，投資者看的是清晰的政策方向、可行的收入模式、透明的採購安排和合理的風險分擔。香港不能只停留在「籌錢」，更應發揮專業所長，做好項目評估、風險分配、合約執行和後續管理，讓專業服務

的價值真正體現。

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正由規模比拼轉向生態比拼。區內其他中心同樣積極進取，投資者比較的不只是市場規模和稅率，更是規則是否清晰、政策是否可預期、爭議能否有效處理，以及跨境項目能否按時、按預算完成。項目籌備不足、審批流程不明、制度銜接成本過高，再成熟的資本市場也難以單獨創造優勢。

由規模比拼轉向生態比拼

展望未來，有三點趨勢值得關注。其一，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將成為亞太財金合作的新焦點，誰能搭建連接資本與項目的高效渠道，誰就能在新一輪競爭中佔得先機。其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上升，區域內的政策協調與開放合作更顯重要，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有

望獲得更大發揮空間。其三，單一市場的優勢，將逐漸讓位於跨市場、跨資產、跨境的綜合服務能力。

這次會議讓世界看到一個開放、專業、有能力承辦高規格財金會議的香港，也讓香港在「十五五」開局之年，把自己清晰地放進區域與國家的坐標系。另一方面，機遇不會自動轉化為成果，香港不能憑一次會議的聲量取勝，要把國際關注變為資金與項目，必須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強化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擴大人才供給，並以清晰、穩定、合乎比例的規則，在安全與開放之間建立可信的平衡。從「搭台者」到「共建者」，從會議成果到長期動能，既需要五年規劃的耐心，更需要日常執行的真章。

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長

從選委會參選新格局看特區治理的制度演進

紀緯紋
港事
港心

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提名期20日結束，選舉主任共接獲111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及40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縱觀整個提名期，報名踴躍、差額競爭擴大，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區治理制度重心，正從平穩有序地完成制度重塑轉向以實質競爭檢驗素質、進而提升治理效能的新階段。

架構重塑：界別擴面與競爭擴容

細看參選名單，約四成人並非現任選委，部分更是上屆落敗後再次參選。36個經選舉產生委員的界別分組中，31個超額報名、確定須投票，僅5個分組為等額報名。多個界別由過去的等額協調轉向差額競爭，競爭性顯著增強，新面孔的湧入亦改變了選委會選舉的參與結構。

參選格局的變化，並非單純的選舉技術調整，而是特區治理制度安排及其內在特徵發生明顯變化的縮影。回顧2021年選委會選舉，其肩負制度重塑與平穩過渡的歷史使命，以維護國家安全與政治穩定為首要任務，高效協調完成了制度切換。如今，隨着新選舉制度日趨成熟，在特區政府編制實施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背景下，社會大眾對政府整體治理效能有了新的期待。制度的重心正從「平穩過渡」轉向「選賢與能」，對參選者素質的要求、預期其對香港和國家發展的貢獻，均不同以往。這一轉變，既是香港在由治及興之路上持續向好的寫照，也是適應新發展階段需要的治理與制度安排作出的必要調整。

不妨從制度主義的框架去解讀。

制度並非靜止不變的規則集合，而是在外部壓力與內部需求交織下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在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下，制度的「關鍵節點」往往緣於舊有安排難以為繼之後的重大轉折。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塑正是如此。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與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終結了對抗性政治行為的空間，使政治環境的結構選擇性發生根本改變，聚焦經濟建設、民生改善、科技創新、融入國家大局等發展，才是凝聚社會更大共識、提升政治人物競爭力的可取之路。制度重塑不僅改變行為誘因，也直接體現在選委會本身的組織架構上。選委會委員規模由1200人擴至1500人，並首次納入基層社團、同鄉社團及中小企業界等新界別，制度架構實現整體完備。這些新界別與經濟發展、民生福祉息息相關，使聚焦發展的群體在制度內獲得更大代表權，與前述回報遞增相互呼應，也為今日的差額競爭奠定了基礎。

實踐深化：差額投票與敘事轉變

制度架構的重塑，亦帶動了制度運作邏輯的轉化。香港國安法是在原有法律體系之上添加的新制度元素，完善選舉制度則是對原有選舉規則的系統性修訂。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保留了差額選舉的規則設計，提名超額即須投票，等額則自動當選。今次選委會選舉提名中，多數界別出現超額報名，使差額投票從制度上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正因如此，參選人不可以「躺贏」，必須以政綱、表現和往績爭取支持，這反過來又強化了制度的競爭性與認受性。

制度調整的影響力，同時延伸到主導社會的敘事方式之上。「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已成為新的敘事主軸，話語的轉變為制度改革提供了正當性，也為社會共識的重建奠定了基礎。不少參選人將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作為核心政綱，正是這一話語轉變的直觀體現。制度、行為和話語三者相互強化，使選委會選舉呈現出新的良性競爭格局，亦構成香港治理制度演進的一個重要面向。

在上述制度變遷的脈絡下，選委在香港當前制度發展、整體社會由治及興路上的重要性更加凸顯。選委會肩負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及選出立法會其中40名議員的重任，委員作為這一新治理架構下的重要組成，必須展現出與由治及興所要求的素質、所需發揮的作用相匹配的特徵。

這種匹配，首先是「有心」與「有料」的統一。服務社會的意願固然是前提，但僅憑一腔熱忱或空喊口號並不足以承擔選委會的憲制責任。委員人選須在所屬界別具備扎實的專業資歷和可驗證的往績，擁有能夠調動業界網絡與資源的實際能力，並對國家發展大局和香港公共行政運作有清晰的認知與承擔意願。專業資歷賦予其判斷政策優劣的底氣，業界網絡使其能夠匯聚分散的訴求，對國家與香港關係的準確理解則確保其提名和投票決定經得起服務國家和香港發展所需的制度檢驗。唯此，選委會才能真正發揮選賢與能的制度功能，為特區良政善治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議論
風生

陳成爐

202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結束，選舉事務處在為期兩周的提名期內，共接獲1155份提名表格。在36個經選舉產生委員的界別分組中，多達31個分組呈現超額報名態勢，這意味着逾八成界別將通過差額選舉決定席位歸屬。這一情況反映出優質民主制度之下充分競爭、優中選優的良性格局已然成型，展現了香港特色優質民主的理性運作機制。

從歷史維度審視，這是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推動民主發展回歸理性、專業與建設性軌道的重要體現。在「愛國者治港」原則築牢的政治底線上，選舉正在成為全方位比拼管治智慧與專業能力的制度化競逐。

過往有輿論認為，在選民結構和界別劃分調整後，選委會選舉的競爭性會減弱，可能陷入形式化的等額分配模式。然而，2026年提名期的實際數據有力地回應了這一疑慮。

注入良性競爭的制度活力

超額報名、跨界競逐成為普遍現象，表明制度的參與度和代表性得到了實質性提升。在涉及核心民生與社會治理的界別中，競爭尤為顯著：社會福利界25人競逐15席，醫學及衛生服務界23人競逐15席，基層社團出現75人競逐60席的競爭狀態。這種廣泛的差額競爭，切實激活了各界別的參與動力，使選舉過程更具實質意義。

新選制之下，要求任何有意願履行選委會職責的治理人才，均須通過合規的提名程序並直面業界選民的檢驗。這種制度化的競爭不僅拉近了參選人與界別的紐帶，也賦予了最終當選者更為堅實的民意基礎與認同度，為特區政治生態注入了良性競爭的制度活力。

數量上的常態化競爭是形式，質量上的優中選優才是本質。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訴求，是為特區治理體系篩選出兼具宏觀視野、專業素養與務實擔當的高素质管治人才。本屆選委會選舉的提名過程，正是彰顯了這一核心訴求。

首先，重量級精英的躬身入局提升了選舉的含金量。媒體披露，本次選舉吸引了眾多在特區管治及專業領域具有深厚資歷的人士參與差額競爭。這些政治與專業領域的代表性人物

下場參選，既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新選舉制度的信任，更樹立了「能者居之」的良性示範。在新機制下，沒有任何參選人擁有天然的豁免權，資歷與聲望必須轉化為服務業界的實際行動，方能贏得信任。

其次，政策建議的建設性與可行性成為考核的硬指標。觀察本屆參選人提交的訴求與政綱可以發現，空洞的政治口號與對抗性論述已被專業的破題方案所取代。工程界參選人聚焦於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落地及大灣區基建銜接；金融界與會計界重點探討如何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理競爭力；教育界與醫療界則緊扣本地專業標準的優化和深層次結構性痛點。這種聚焦實務、講求實效的選拔基調，使得選舉回歸到探討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的理性軌道。

「競爭」與「優選」的良性互動，進一步拓寬了愛國愛港陣營的社會光譜，並為特區管治梯隊的更替創造了合規渠道。

在本屆提名名單中，「素人」與行業中堅力量的廣泛參與成為顯著亮點。以教育界為例，在14名參選人中，有11名為首次參選的新面孔；金融界亦吸引了過往較少直接參選的外資大行高管。這表明新選制的包容性與公信力進一步贏得專業階層的廣泛共鳴。他們期望通過選委會這一關鍵平台，將國際視野與專業經驗轉化為推動特區科學決策的建設性力量。

持續吸納優秀管治人才

與此同時，第五界別中，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的提名，呈現明顯的年輕化趨勢。一批具備跨國工作背景、扎實學術功底及深耕基層治理的青年專業人才踴躍報名。這種新老更替的機制化演進，不僅有助於打破既往政治人才同質化、老齡化的樽頸，更向社會釋放了清晰信號：體制的選賢任能通道對所有秉持愛國愛港立場、具備專業才幹的人士平等開放。

香港由治及興的深層動力，取決於治理體系能否持續吸納、甄選出優秀的管治人才。這是「一國兩制」薪火相傳的關鍵。通過這場高標準、高素質的選舉，最終於2027年2月1日依法組成的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必將具備更廣泛的代表性與深厚的專業素養，從而在未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更好地履行法定職責，為特區長治久安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

金牌之外，體育何以強國育人



有話
要說

林順潮

名古屋亞運圓滿落幕，中國體育健兒以169金雄踞榜首，再次展現雄厚的競技實力。輝煌成績背後，是運動員多年的拼搏，也是國家長期重視體育發展、系統培養人才的成果。金牌閃耀，振奮人心。然而，衡量體育強國的成就，目光還須投向競技場之外。一國體育之強，強在世界冠軍的巔峰表現，更強在億萬民眾的健康體魄與精神風貌。如何讓競技體育的輝煌成果帶動全民健身、促進青少年成長，令更多人在運動中受益，是體育強國建設值得重視的長遠課題。

加強風險評估提供運動指導

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快、生活方式轉變，慢性疾病已成為影響國民健康的重要挑戰。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部分癌症，均與肥胖、缺乏運動等風險因素密切相關。作為醫生，筆者深知，醫療技術再進步，醫生、病床和藥物投入再增加，也難以完全彌補長年不良生活習慣帶來的健康損害。要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必須把疾病

防線前移。中國傳統醫學講求「治未病」，現代預防醫學同樣重視及早控制疾病風險。規律運動、合理膳食、科學管理體重，有助預防多種慢性疾病，改善身體機能與心理健康。國家近年開展「體重管理年」活動，今年7月國務院印發的《國民健康「十五五」規劃》進一步強調「主動健康」，提出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30年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比例達到40%左右。

政策方向已經明確，如何落到百姓生活，尤為重要。基層醫療可加強健康風險評估，為慢性病高風險人士提供合適的運動指導；學校、職場和社區則應創造更多日常運動機會，讓不同年齡、不同健康狀況的市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鍛煉方式。把醫療服務與社區健康支援鏈有效銜接，才能讓預防理念逐步轉化為生活習慣。

體育要回歸「育」的本質。其育人價值，應同時涵蓋身體鍛煉、意志磨礪、規則意識與人格成長。如何引導年輕人在競爭中成長，考驗着體育教育的理念，也折射出社會的勝負胸襟與格局高度。

其一，「育志」，在挑戰自我中實現

成長。奧林匹克精神倡導卓越、友誼與尊重，其對「卓越」的闡釋尤其值得注意，運動員固然會與他人比較，但實現個人目標、盡己所能和持續進步，也屬於卓越的重要內涵。2025年《心理學前沿》一項涵蓋21項研究的系統綜述發現，身體活動與青少年心理韌性呈顯著正相關。訓練中的反覆嘗試、比賽中的失誤與挫折，為年輕人提供了學習調整心態、應對壓力的機會。這些經歷所磨礪的堅毅與自律，對求學、工作乃至人生道路同樣具有長遠意義。

其二，「育德」，在競技中學會合作與尊重。本屆亞運，日本游泳名將池江璃花子歷經白血病磨難再次站上領獎台，中國選手張雨霏主動上前擁抱這位多年賽場對手。兩人在泳池中奮力爭先，在賽場外惺惺相惜。對手可以是超越自我的動力，也可以是彼此欣賞、相互成就的同行者。尊重他人、善於合作，正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

其三，「育心」，在勝負考驗中鍛煉從容胸襟。追求卓越需要敢於爭先的勇氣，也要有面對失敗的氣度。勝而不驕、敗而不餒，尊重規則、尊重對手，是體育精神的重要內涵。然而，體育的育人價值並非

自然形成。健康的競賽文化，應當鼓勵運動員全力爭勝，也容許他們在失敗中學習，在競爭中成長。

一個國家需要培養世界冠軍的體系，也需要讓普通人終身受益於運動的體育文化。本屆亞運中國體育健兒再創佳績，背後是長期形成的人才發掘、梯隊培養與科學訓練體系。一個天才可能是曇花一現，一代人才卻需要土壤。同樣，全民運動習慣的養成，也離不開長期投入與制度支持。

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2021年刊發研究，分析奧運會對民眾身體活動的影響，發現大型賽事本身未必能持續提高全民運動參與水平。賽事可以點燃熱情，運動習慣卻需要長期培養。從觀眾席走向運動場，中間還有場地、時間、費用、專業指導與持續參與機會等現實門檻。冠軍的榜樣力量要轉化為全民參與，須有完善的公共體育服務承接。

關注學童運動不足問題

國家《體育強國建設「十五五」規劃》將競技成績、全民鍛煉比例、國民體質及體育場地建設共同納入發展指標，並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這反映出體

育發展需要兼顧頂尖競技與廣泛參與。從學校體育、社區俱樂部到業餘賽事，應建立不同年齡、不同水平人士持續參與的渠道，讓普通運動愛好者有機會進步，有潛質的年輕人亦能獲得更高水平的訓練。擴大全民體育的參與基礎，也有助於孕育更深厚的競技人才土壤。

香港在本屆亞運創下佳績，令人鼓舞，而學童運動不足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根據2024/25學年的政府數據，93.6%的受訪學生未達每日一小時中高强度運動的建議水平。精英體育成績與大眾運動參與，是兩項同時需要重視的政策成果。香港應善用大型賽事帶來的社會關注，增加學校與社區運動機會，讓市民由觀看比賽的熱情，逐步轉化為親身參與的習慣。

「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興。」習近平主席這句話，道出體育與國家命運的深層聯繫。賽場上的獎牌令人振奮，體育強國的根基還在於億萬民眾的廣泛參與。讓全民健身蔚然成風，讓自強不息、團結協作、尊重勝負的體育精神深入人心，體育強國建設便有了更加持久的動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